

古代中国权力与当代中国思想^{*}

威廉·卡拉汉 卡宁汉－克洛斯◎

【内容提要】 在《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中，阎学通展示了其一直以来关于中国先秦时期国家间政治哲学研究的成果。阎学通与其同事们令人关注的讨论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兼顾先秦历史时代和中国崛起的21世纪这两个时代背景，正确理解中国典籍著作。此外，该书讨论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那些笃信“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当代权力”间联系的学者。本文认为这本书应该被放置到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翻译的政治这三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讨论，该书可以起如下作用：向中国政治领导建言与消除西方疑虑。

【关键词】 先秦项目 国际关系理论 翻译的政治 受众

阎学通的最新力作《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是其一直进行的关于中国先秦时期国家间政治哲学研究的成果。^① 该书在众多层面上都颇具意义，已在西方引起

*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英国经济与社会科学委员会对英国高校联盟中国中心（British Inter-university China Centre）的资助（RES - 580 - 28 - 0008）；卡拉汉同时感谢雷弗休姆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提供的研究基金（2010—2011年）。

① Yan Xuo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国际政治科学》2012/2（总第30期），第133—161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了公共知识分子和学者们的关注。^① 本文将首先就阎学通及其同事们如何利用先秦思想来构建中国崛起的哲学和政治观点这一学术问题进行分析。本文将探讨“王”和“霸”的关系，进而批判性地分析阎的论点，即中国应该通过追求政治权力而非经济或军事权力来创造一种新的世界领导权。虽然该书将“王”宽泛地翻译为“仁政”，但我们认为按原义翻译为“王道”能更准确地反映阎学通关于中国政治精英的道德领导力决定新的世界秩序的论点。基于细致的文本分析，本文将书中论点置于广泛的学术讨论之中，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和翻译的政治。最后，本文认为该书适合除学者外的两类听众，向中国政治领导人建言与消除西方疑虑。本文旨在考察《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如何将传统理念复兴与重新诠释，以为中国及世界的未来谋篇布局。

一、先秦项目

该书仅展现了被卡宁汉 - 克洛斯 (Cunningham-Cross) 称为阎学通“先秦项目”中的一小部分节选。^② 全书开头是阎撰写的三章，^③ 随后是三位中国学者的评论，最后是阎的回应。此外，书中还包括对阎学通的一次颇具启发性的访谈，让读者得以深刻了解阎的个性及其先驱性工作背后的动机。开篇的三章是对阎及其同事过去数年研究项目成果的集中反映。尽管如此，将这些章节置于整个先秦项目的大背景当中加以理解极为重要。

2005 年，阎学通及其同事徐进（该书的执笔人之一）开始了中国先秦思想的研究。其目的在于从古老中国的经验和政治哲学家身上汲取营养

① 比如可参见“Banyan: Nothing New Under Heaven,” *The Economist*, June 16,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18836024?story_id=18836024; Gideon Rachman, “A Test of Will,” *Financial Times*, July 29, 2011.

② Linsay Cunningham-Cross, “Using the Past to (Re-) write the Future,” presented at “China’s Future and the World’s Future” workshop,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February 11, 2011.

③ 第三章由黄宇兴共同写作，当时黄宇兴是阎学通在清华大学的一名学生。

进而丰富和提高对国际政治的现代理解，我们会在下文中对该目的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阎相信，源于秦统一中国之前时代的古代典籍对今天的学者而言极为有用，因为那个阶段的国家间关系与当代国际政治之间存在着众多相似之处。^①同时，这个时期也经常被看做中国哲学思想的巅峰时期，先秦典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在过去两千年中对中华帝国的政治具有持久的影响。^②

2008年，阎学通和徐进出版了供国际政治专业学生阅读的先秦思想读物，这是“先秦项目”的首个出版物。^③该书的特色在于，将先秦典籍原著文本配以介绍性说明、翻译成现代汉语，并提出可供讨论的问题。其既定目标为“让读者们从先秦思想家身上得到启发，进而加深他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理解”。^④2009年，阎和徐又编辑出版了《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一书，采用了更具分析性的视角审视了同一批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和典籍。^⑤该书是多篇对于先秦经典著作评论文章的合集，这些著作包括阎确定的7位重要思想家——管子、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以及韩非子，还有很多那个时代的其他重要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以及《礼记》等。每篇文章都包括了作者对先秦思想与当代中国和国际关系研究的相关思考。阎学通等人还在一些处于领先地位的中文国际关系期刊上广泛发表了该议题的文章。《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的第一至三章均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相关内容的翻译。第四至六章的评论文章和第七章阎的回应则是从其主编期刊《国际政治科学》的一期特刊中的相关文章翻译而成的。^⑥

①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 Christopher A. Ford, *The Mind of Empire: China's History and Modern Foreign Relation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0).

③ 阎学通、徐进编《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

④ 同上书。

⑤ 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⑥ 《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3期。

不过,《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仍极为重要,因为它首次将这些精选的学术论文译成英语,从而把阎的“先秦项目”展示给了新的读者。除了有关荀子的第二章内容曾在2008年发表于英文版的《中国国际政治学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之外,该书的其他章节此前均仅有中文版。除了运用先秦思想丰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先驱性工作外,阎学通还是一位重要的战略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决策者和大众传媒的舆论制造者均颇具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超越了普林斯顿—中国丛书“从中国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目标。

二、为什么是先秦思想?

正如该书中接受陆昕采访时为自己激情辩护的那样,阎学通对国际关系的理解是现实主义的,这决定了他研究先秦思想的目标及其研究中对材料的选择。^①在《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的第七章,阎提出了三个研究先秦思想的原因以回应批评者。首先,阎认为从先秦著作中得到的感悟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阎对于科学普世性的信仰使之始终反对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②相反,阎希望他的项目能使学者们从中国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丰富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③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学者,阎将理论当做理解“真实世界”的工具。这个工具经过校正和改进可以更好地解释甚至预测历史发展进程。根据阎的想法,目前的国际政治理论主要建立在欧洲的概念与经验之上,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可以提供新的洞察以升华现有理论。^④这将使得中国学者至今仍

① Lu Xin, “Yan Xuetong: A Realist Scholar Clinging to Scientific Prediction,” in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240–246.

② 这个问题阎在书的附录三中直接反复地重申,见“Why Is There No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252–259.

③ 阎学通“编者的话”,载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1页。

④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202–203.

被认为可以为西方的这一社会科学领域作出贡献。

其次，阎相信对先秦思想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当代现实的理解。他认为强调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性证明国际政治持久的一面。然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阎是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者的视角来研究这些先秦著作的。他相信国际体系中存在普遍性规律，只是尚未被发现。但是，这个观点让阎对先秦思想进行了有选择性的研究，选择那些符合其对国际体系看法的思想，排除了其他不相关的或没有帮助的。阎认为，一部分先秦思想反映了人性中的恒久规律，为国际关系中不变的方面提供见解。先秦思想的一些部分则是无关紧要的，只能被视为对特殊国际体系的一种特殊解读。^①因此，阎的方法是选择先秦思想中那些符合当代现实的部分，而那些与他对国际政治本质理解不相符的思想就被排除在外了。比如，阎排除了孟子的人性善的理论，因为他认为这是不科学的。^②由于这与阎对“人性”在决策过程中作用的理解和现实主义对人类行为的假设不相符。阎还排除了那些他认为没有用的理论和见解。比如，他告诫其他学者们不要引入老子的“无为”概念，因为这对中国崛起目标的实现毫无帮助。^③阎根据其对中国国际政治本质现有的理解来选择和重新解读了先秦政治思想，但从未反思其作出这些选择的过程。^④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讨论的那样，阎学通取舍之间的选择，明显塑造了其先秦研究项目中呈现的特有阐释。

最后，阎期待中国古代思想可以指导当代政策，特别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经验借鉴。^⑤阎认为，先秦思想有助于回答有关如何管理中国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的角色变化等特定问题。第三个目标应该是最重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2.

② Ibid., p. 208.

③ Ibid., p. 217.

④ 在陆昕对阎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阎对国际关系性质和范围的看法基本上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形成的。阎说，以前他并不真的知道国际关系是什么，但在第一年的学习之后，他就学会这门学科的“语言”，并能够有所建树。阎持有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对“科学方法”的偏好都是在那个时期形成的，并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其现在古代著作研究的方法路径。（参见陆昕《阎学通：一个坚持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者》。）

⑤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3.

要的,因为它推动了项目的其他部分,并且对阎在古代典籍著作的选择上发挥了关键作用。阎把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未来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看做今天中国面对的最重要议题。因此,阎希望从先秦思想研究中所得到的见解一定要能在某种程度上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书中所挑选的先秦著作都讨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在国际政治中所面对的某些具体问题。比如,在第一章中,阎就强调了管子、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和韩非子等7位重要哲学家传统上的主要区别。

他列举了很多例子来阐释每个思想家独到的分析方法,这些思想家都关注了世界政治中国家兴衰的问题。^① 同样,阎主张将《战国策》纳入他的项目之中。虽然经常有人提出此书的哲学价值不高,但阎认为它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它关于获得霸权的观点对今天的大国崛起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② 综观其著作,阎选用的先秦思想典籍篇章中都提到大国崛起及获得世界霸权或“领导”的相关问题。

通过聚焦于霸权和世界领导的主题,阎学通将先秦思想与中国的未来崛起(以及中国古代思想与中国现代权力)推定式地联系起来。尽管阎学通始终强调突出不同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但他的先秦思想研究整体上对中国未来崛起及其世界意义进行了十分清晰的阐释。通过他对先秦哲学的解读,阎学通断言,中国的崛起现在看来已成必然,且这一过程也将会是和平的。^③ 这是因为中国的领导将遵循一种与所谓的“霸权”截然不同的模式。不同于成为美国式的霸权,中国将在世界范围内施行“仁政”,依靠有道德的政治实力,而非经济增长和军事力量等物质力量。因而,中国实施“仁政”将有助于建立一个全新而和谐的世界秩序。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p. 26-29.

② Ibid., pp. 107, 112.

③ 尽管自从2005年后,“和平崛起”这一概念已较少使用,阎却仍然明确地将其与某些先秦思想家们的理论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个概念先前进入国家政策时,阎是少数几个持批评观点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参见阎学通《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环境与对外战略》,《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4期,第5—20页。

三、中国：世界的新型领导者

阎和很多他引用的先秦学者们都认为国际政治中大国兴衰的本质具有零和性质：一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相对的衰落。但是他认为，基于对先秦思想理念的借鉴，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可以既不使用武力也不威胁体系的稳定。这是因为，不同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先秦思想家把国际政治中的领导国家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西方理论只讨论霸权，先秦思想则介绍了世界领导权不同模式的可能性，即“真正的王权”或者“王道”。^① 这个概念是阎的先秦思想著作的核心，并在《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中被反复提及。^② 但是，编者在该书并未使用“真正的王权”或“圣明君主”之类的标准译法，而是选择了将其翻译为“仁政”。究其原因，正如该书中编者指出的那样，阎学通显然并不主张重建君主体制，不主张依靠一个圣贤以道德善治拯救世界。^③ 但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使用通常的翻译“真正的王权”或其中文原文，因为我们并不赞同编者对阎学通成果的解读。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阎对于中国崛起及其所带来的新世界秩序的阐述在某些方面反映了编者刻意希望避免的“真正的王权”的定义。

阎学通认为，先秦思想家普遍相信存在两种国家间的领导权，即“王”和“霸”。^④ 即使在《战国策》这一章中，虽然“王权”的概念并未出现，阎仍然频繁地希望引起读者对不同类型或特性的霸权的关注，他这

① 刘江永《管子的霸业思想》，载阎学通、徐进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44页。

② 对于关注中国过去与未来的其他研究而言，王霸之辨也同样关键。参见刘明福《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战略定位》，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01—136页；Wang Hui, *The Politics of Imagining Asi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1–33。

③ “A Note on the Translation,” in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ix.

④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47.

样写道 “王权和霸权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依靠道义而后者依靠物质实力来保持国家间秩序。”^① 甚至是先秦思想家中最具有怀疑精神的韩非子，都相信在过去仁爱和美德对王权非常重要，只是它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没那么有用了。^②

因此，“真正的王权”或者“仁政”被认为是一种有益的统治方式，与霸权这一负面价值观相对应，阎经常把霸权与美国以及美国在冷战后期的单边主义联系起来。将王权与霸权相分开的标志就是达到必要的道德水准。阎引用了很多先秦著作来证明这种世界领导权无法通过武力获得，^③而是先要赢得人心。^④ 为了在世界上取得王权的地位，一国不应该仅仅依靠军事实力，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物质实力；相反，王权是建立在一国道德基础上的政治实力。

同时，阎学通还把对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解应用于其先秦著作研究当中。阎对于国际体系中权力的理解和其他现实主义学者并无区别：权力是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拥有的经济、军事、政治以及可能存在的文化实力的函数。他对于先秦思想的运用使得这一函数发生了某些变化，最明显的就是，政治实力成为中国的“综合国力”的决定因素。^⑤ 但是，阎关于权力本质的最基本假设，即权力作为一种存在可以被占有、增加、失去或赢得，具有不可挑战性。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阎以先秦思想挑战主流的“政治权力来源于经济和（或）军事力量”的假设。他认为，中国将努力成为一个依靠政治实力而非经济或军事实力的王权国家。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49.

② Ibid., p. 65.

③ 刘江永 《管子的霸业思想》，第46页；阎学通、徐进编 《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17、64—65页；徐进 《孟子的仁政治天下思想》，载阎学通、徐进等 《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128页。

④ 阎学通、徐进编 《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7、47页；徐进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载阎学通、徐进等 《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4页。

⑤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53.

对于先秦思想家而言，政治实力与当代国际政治中的理解不甚相同。阎认为，它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当代理解中的软实力，因为软实力不区分文化和政治因素。^① 对于先秦思想家来说政治因素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所有政治实力都来源于一个国家的领袖。^② 孔子认为，所有政治都是君主的政治；^③ 荀子认为 “一个国家是安全还是危险，是好还是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而非其他人。”^④ 一些先秦著作还强调君主推行正确（公平）政策^⑤和选任官员程序的重要性。^⑥ 比如，管子认为 “一个好君主会选择有能力的大臣，没有道德的君主会把国家带向灭亡。”^⑦ 正如阎在其他关于先秦著作的分析中论及的那样，能力等同于道德的虔诚而非技术能力。因此，政治实力来源于君主的个人道德，^⑧ 他任命的大臣们以及他们共同制定的政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统治者的国家成为世界上真正的王权国家的能力。因此，为了成为王权国家，崛起的中国应该依靠“政党—国家”的道德领导力，在任命官员时选择会公正执行政策的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在此，阎同意中国其他一些评论家的论点，认为政治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既依赖于中央，又依赖于全国上下普通干部的道德水平。因此，包括道德教育的“干部培训”成为共产党党内一项蓬勃发展且资金充足的活动。^⑨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01.

② 王海滨 《〈吕氏春秋〉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1期，第69页；徐进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第2页；阎学通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02页。

③ 徐进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第5页。

④ Yan Xuetong, “Xun Zi’s Thoughts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1, 2008, p. 139.

⑤ 阎学通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第102页。

⑥ 阎学通、黄宇兴 《〈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86页。

⑦ 徐进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第2页。

⑧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53.

⑨ See Frank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Elite Training and State Building in Today’s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参见一篇娱乐社会时评，韩寒 《韩峰是个好干部》，韩寒个人博客 (blog.sina.com.cn/twocold)，2010年3月4日。

阎学通对先秦思想解释的最重要方面是,先秦思想相信王权国家不仅使本国国民获益,也将普惠于整个国家间体系。根据众多先秦史料,一个拥有崇高道德品质的贤君能够超越自己的领土去保障整个体系的稳定。^① 阎认为,当代霸权稳定论忽略了霸权本质与国家间体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他引用荀子的实例展示了王权国家如何带来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依靠军事实力的国家则会使其他国家疏远并树立潜在的敌人,从而给国际体系带来不稳定的潜在影响。^②

阎写道,根据先秦的思维方式,“我们可以假定霸权的道德水平与国际体系的稳定程度及其持续时间存在关联”。^③ 阎希望我们从他对先秦思想的研究中总结出这样一条经验——“道德和国家间秩序是直接相关的,特别是领导者的个人道德水平及其在决定国家间秩序稳定中所发挥的作用。”^④ 因此,如果中国要在世界上变成一个真正的王权国家,那么中国的领导层不仅要为中国人民,还要为全世界提供道德领导。

阎所描述的未来是这样的:道德优越的中国的影响力将向外扩散,从而带来一个更加和谐和稳定的世界秩序。这样一个“和谐世界”是通过展示中国道路的优越性并积极鼓励其他国家效仿来实现的。因此,阎对于“王权”的理解与《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的编辑试图去避免的“由一个能够以其高尚道德拯救世界的圣贤君主领导的君主制”的定义并不冲突。

从这个角度来看,该书或许可以让我们了解下一代中国领导层以及他们其中一些人正在推动的所谓“红色文化”的道德运动。

① 杨传辉 《孔子的仁德取天下思想》,载阎学通、徐进等 《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82页;徐进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第9页;阎学通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第95页。

② 请见表2.1所示不同领导国家类型可能导致的不同结果,载于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72。

③ Ibid., p. 65.

④ Ibid., p. 39.

四、更广泛的学术背景

我们对《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的文本分析显示，阎学通与其同事们令人关注的讨论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兼顾先秦历史时代和中国崛起的 21 世纪这两个时代背景，正确理解中国典籍著作？此外，该书讨论的参与者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那些笃信“中国古代思想”和“中国当代权力”之间联系的学者。本部分将把该书放置于三个更为宽泛的学术背景下进行讨论，即国际关系理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翻译的政治。

（一）国际关系理论

作为国际关系理论更为宽泛思潮的组成部分，《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构思于 2007 年，发表于 2011 年。由于对小布什的单边外交政策的广泛批评和“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21 世纪的头十年里产生了对美国支配国际政治和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西方和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家都指出：国际关系理论是以欧洲为中心，是建立在欧洲的历史和哲学思想之上的。他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使西方价值观地方化，并且寻求一个超越欧美的跨国规范。于是，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印度、俄罗斯、伊斯兰国家以及南美洲对全球规范和世界秩序的观点。^①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引起了最大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拥有着悠久

① 两篇特刊标志着国际研究中多文化融合的趋势，请参见 J. Ann Tickner and Andre P. Tsyganov, "Responsible Scholarship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Symposiu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661 - 666;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Preface: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R Theory: Reflections on and from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285 - 286。第二个项目也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现已以著作形式出版：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Arlene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的全球政治历史和丰富的哲学思想传统。

1998年,奥勒·维沃(Ole Wæver)在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其他来源的研究中如此总结道:最可能基于独特哲学思想传统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传统的国家就是中国,尽管它目前还尚未建立任何独立理论。^① 21世纪的头十年,很多学者对此作出了回应并号召创建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立中国学派的最突出倡导者是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此外还有任晓、王义桅以及石斌等。^②

由于阎学通一方面极为直接地发展中国思想以丰富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方面又反对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中秦亚青等学者回应阎论点的一章非常有帮助。^③ 秦认为,创建中国学派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解决世界问题最可能的方法。^④ 很多中国人和部分西方人认为,国际关系中国学派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政治影响力的自然延伸。换言之,要成为强国,就必须要有自己关于世界秩序的理论。^⑤ 据此观点,如美国提倡“民主和平”等理

① Ole Wæver, “The Sociology of a Not So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American and European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 696. 正如阎所指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就一直有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

② Qin Yaqing, “Why Is There No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7, No. 3, 2007, pp. 313–340; Wang Yiwei, “China: Between Copying and Constructing,” in Arlene Tickner and Ole Wæ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pp. 103–119; Wang Yiwei, “Between Science and Art: Questionab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8, No. 2, 2007, pp. 191–208; 石斌《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第8—13页;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关于中国学派的分析,参见Cunningham-Cross, “Re-imagining the World Through Chinese Eyes: the Search for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resented at 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ference, Manchester, April 27–29, 2011.

③ 关于阎、秦等重要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作出贡献的分析,参见William A. Callahan and Elena Barabantseva, eds.,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Relations*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④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第7—13页。

⑤ 秦亚青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版; Tang Shipping, “Coming Intellectual Power,” *China Security*, Vol. 4, No. 2, 2008, pp. 14–5.

念、英国讨论的“国际社会”，作为中国对世界文明和全球秩序的贡献，中国提出“天下”和“和谐世界”等理念也是十分自然的。^① 据此，由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实力被看做硬实力的副产品，中国需要把其新经济实力转化成长久的政治、文化和规范实力。

阎批评建立中国学派的努力是本末倒置：学者们与其坚持建立中国学派的“必要性”，不如努力形成足以吸引全球关注的思想。事实上，阎指出修昔底德的古格言“弱肉强食”至今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仍十分流行。^② 秦将此批评铭记于心，并曾考虑将中国古代的“天下”概念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但最终因以等级角度看世界秩序存在问题而放弃。放下帝国的概念之后，秦转而将“关系”作为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③ 阎将不同意这些尝试。正如我们所见，阎认为一个合理的等级秩序能够解决世界的问题。至于“关系”，杨倩如提出了一个相似的方法，认为应该把王权和霸权放在一起考虑。不过，阎坚持它们两者不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④ 更为重要的是，“关系”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新概念，也不是中国特有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主题之一。^⑤

于是我们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先秦思想中的王霸观念可以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什么？阎的解读是，王权要求一个国家将发展重点放在政治实力而非经济或军事实力上。圣贤君主推动国家间等级制度的建立，而政治实力是通过君主的个人道德积累起来的，并能够带来秩序与和平。阎认为，只要我们用科学理论加以系统阐释，这些先秦规范就是具有普世性的。“先秦项目”十分谨慎地将古代中国文献中的高层次人文学说与现

① 参见 William A. Callahan, “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Theory: Race, Class and the English School,” *Global Society*, Vol. 18, No. 4, 2004, pp. 305–323.

②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2.

③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5—20页。

④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8.

⑤ 参见 Michael J. Shapiro and James Der Derian, eds., *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 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9).

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这一高级社会科学结合起来,作为以中国仁爱的世界领导权替代“美国霸权”的方法。

虽然该书在某种程度上是面向国外读者的,但我们不确定如此宏大的项目能在中国之外的国际关系学界取得多大成功。理性主义者通常对这种文化主义的论断很谨慎。比如,研究中国历史的现实主义者王元康曾总结道:中国文化基本上无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王对于宋朝和明朝历史的细致研究证实了结构现实主义的立场:一个强大的中国与任何一个强国一样将会扩张,而一个虚弱的中国则会主动适应其他大国。^①如果事实如此,那么说服社会科学家学习古典中文将十分困难,而且这不仅仅是非中国学者的问题。如阎所承认的那样,很多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缺乏研究先秦典籍著作的中国古典中文素养。^②

作为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鸿沟的另一面,上述那些对分化国际关系理论有兴趣的学者基本上都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持怀疑态度。阎所使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认识论,用科学方法寻求真理、道德和权力的唯一和稳定的概念,而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家则不去探寻一个具普世性的概念,他们对实证主义普世性的认识论都持怀疑态度。^③比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中的论证:道德是帝国主义宣传的一种重要的控制工具。由于每个帝国都将自己的文化作为道德标准(英国提出的“白人

① Yuan-Kang Wang, *Harmony and War: Confucian Culture and Chinese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1). 另外一篇对历史和国际关系富有经验的分析,参见 Victoria Tin-bor Hui, *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45.

③ 自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在《道德的谱系》(1887)一书中指出道德是一种偶然发生的文化产物而非宗教的普世以来,普世道德就在西方引起了质疑。参见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trans. and edited by Douglas Smith (Oxford: Oxford World's Classics, 1996)。在中国,庄子在《杂篇·盗跖第二十九》中也对儒家文化的普世道德观提出了质疑。参见 Chuang-tzu, trans. and edited by A. C. Graham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p. 207 - 210, 233 - 242。有关庄子这篇典故和国际关系理论的讨论,参见 William A. Callahan,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 22 - 23。

的负担”，法国提出的“教化使命”以及中国提出的“华夷之辨”），许多人对大国提出的道德性论点保持警觉。因此，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家来说，中国的思想是众多选择之一，但如果要单纯地用中国式的道德观念来代替欧洲中心主义，或者以中国的新霸权代替美国的统治地位则是不可取的。^①

虽然阎和其他人经常说小布什的单边主义是“不道德的”且是霸权主义的，但小布什自己则将美国外交政策陈述为“正义美国与邪恶轴心的对抗”。问题不是缺少道德判断，而是道德这个词被赋予了太多的含义，而每种含义都不存在讨论的余地。中国所呼吁的道德秩序（如打击“三股邪恶势力”之类）其实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中国定位为道德上正义的一边，而认为其他方式都是不道德的。

另一方面，在讨论道德问题时，首先各方都需要尊重他人多元化的价值观和对政治的多样性理解。所以，中国思想在参与国际关系理论讨论时，提出的并非是一个独占性的解决方案，而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这种认识论符合后实证主义的主体间解释，而不是实证主义对一个单一真相的探寻。

最后，阎学通对等级秩序的推崇恐怕不光在西方，即使对中国周边邻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难以接受的。国内社会个体的平等和国际社会国家的平等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目标，虽然这一目标尚未普遍达成。阎所提出的“小国或弱国服从于中国所领导的等级制度”的想法在东亚很难得到认同。姜灿雄与阎学通有着类似的分析，他认为在21世纪，东亚国家不会去制衡中国，因为历史上中国是对他们很仁慈的霸主“东亚国家认为中国重新成为东亚的权力中心是非常自然的。”^② 在21世纪头十

^① 参见 William A. Callahan,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No. 4, 2008, pp. 749-761。

^②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4; 也可参见 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的中期，中国对其邻国开展魅力攻势之时，类似的看法非常普遍。^①然而姜的论点在 2009 年到 2011 年被证实是错误的：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与其邻国发生争端之后，许多东亚国家确实开始制衡中国崛起的力量，而他们采取的行动则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等等。那么，阎是否会说这一现象恰恰证实了他“政治实力应该依靠道德而非军事实力”的论断呢？

(二) 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与爱国的忧患意识

先秦项目中解释性的人文学科研究与理性的社会科学相结合的做法可能会招致西方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共同的疏远。但这种将文化规范与科学方法相混合的做法在中国相当普遍。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著述进行分析时，墨子刻 (Thomas Metzger) 和黄乐嫣 (Gloria Davies) 都指出了其极为鲜明的规范性特征。“中国”被看做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那些无法令中国和中华文明达到完美的问题而担忧，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章中经常反映出来的一种爱国主义情绪”。^②这种“忧患”意识让中国知识分子感到一种道德上的使命感，促使他们努力发现问题并将其解决，以使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和一种文明日臻完善。这样说来，阎将古代典籍研究与公共政策联系起来也就不奇怪了，因为作为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他有义务帮助中国崛起为一个道德强国。

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争论一般都是针对中国的可能性与应然性，而不是针对其现实情况。不断完善中国的需要意味着墨子刻所谓的“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即把世界看做一个整体系统，各部分都根据依从内在法则的内部结构而发展。如果忧虑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找到正确反映世界发展规律的理论和方法，那么中国的问题就能一次性得

①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 Gloria Davies, *Worrying About China: The Language of Chinese Critical Inqui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

到解决。^① 所以，中国的批评性研究兼具规范性与实证性，在语言上表现出一种对真理存在的确定性。而知识分子的道德义务就在于发现真理，消除中国的不完善，从而将中国重新建立成为世界的道德中心。黄乐嫣指出：爱国的忧患意识将中国集中关注为“问题”，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对更广泛的人类问题的考虑。^② 但《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中的讨论表明，这种忧患意识的范围在扩大：中国的完善已经与中国世界的完善紧密地联系起来。“先秦项目”利用王霸思想对大国崛起作出解释，进而正确地解读了历史，为指导中国的崛起提供了正确的方案，从而为整个世界提供最大化收益。

同样地，先秦思想研究对方法论的特别关注也反映出“认识论的乐观主义”。一篇讨论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的先驱性文章指出，中国学者应在方法论问题上下更大工夫。^③ 阎和其他学者花了大量时间讨论建立理论和分析文本恰当的科学方法。这并不是简单的与西方全然不同的中国传统研究方式，而是儒家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中国社会科学家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之后的美国社会科学）训练中学到的现代实证主义之间的结合。

这样，“先秦项目”也符合中国知识界的争论。阎就是众多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有着忧患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担心中央政府过分关注经济发展的物质因素而扭曲了中国的价值观，牵掣中国在全球成功的前景。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从自由派人士许纪霖到刘明福大校这样的军官，也都对中国改革时期出现的“拜金主义”感到忧虑。^④ 但对这一状况的分

① Thomas Metzger, *Clouds Across the Pacific: Essays on the Clash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litical Theories Toda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1 – 31, 295; Gloria Davies, *Worrying About China*, p. 23.

② Gloria Davies, *Worrying About China*, p. 7; 也可参见刘明福《中国梦》，第284页。

③ Song Xinning, “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26, 2001, pp. 61 – 74.

④ 有关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讨论，参见 Timothy Creek, “Xu Jilin and the Thought Work of China’s Public Intellectuals,” *China Quarterly*, No. 186, 2006, pp. 401 – 20.

析却使三人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梦》一书的作者刘明福认为中国力争成为一个经济上的超级大国是一个错误。他认为,一个富裕的贸易大国可能会被其他军事强国像“肥羊”一样吞食。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强国,富国必须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与邓小平倡导的化剑为犁的“和平与发展”政策不同,刘认为中国需要把一些“钱袋”变成“弹药腰带”。^①像他这样强调经济发展要为军事发展服务的思想可以被视为20世纪初严复提出的富国强兵的现代化思想的复苏。^②刘如此强调军事实力,与阎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然而在某些方面,二者依然存在着共同点:阎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由道德高尚的统治者选择有能力的官员来管理;而刘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领导危机”:干部的腐败、平庸以及观念的僵化。在对文官腐败如何拖垮苏联共产党进行详细的分析之后,刘提出中国应该通过更好的干部培训解决领导危机问题。^③所以,阎与刘在政策建议上可谓殊途同归:二者都强调领导干部的道德操守。

与阎一样,许纪霖也对经济政策和“富国强兵”的提法表示了忧虑。但与阎不同的是,他的研究并非为了帮助中国崛起;相反,他认为中国已经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了。他感兴趣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使用这一新的实力“中国的崛起已是世界公认的事实,那么中国又将何去何从呢?作为一个大国,它将呈现给世界一个怎样的文明价值观呢?”^④不同于刘在经济繁荣与军事实力之间寻求再平衡,许认为真正需要的是在“繁荣与权力”和“文明”之间作出选择。他的选择是“文明”,但与注重中国古代

① 刘明福 《中国梦》,第244页。

② 参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富国强兵”也与先秦法学思想有关联,但在阎学通的《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中却并未得到讨论。

③ 刘明福 《中国梦》,第292—296页。也可参见 Frank Pieke, *The Good Communist*。

④ 许纪霖 《普世文明还是中国价值?近十年中国历史主义思潮之批判》,《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2fad0c0100red2.html; 许纪霖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从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谈起》,2010年5月23日,参见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88285>。

价值观独有性的历史学家不同，许看到的是未来。他认为中国需要奉行全球主流的普世价值观，即自由民主、人权与社会正义。

与许相同但与刘不同的是，阎对普世价值观也具有兴趣，但并不是追求主流的全球价值观，因为他认为那是“西方的”，阎所追求的是将中国价值观普世化。不幸的是，阎对于他要推广什么样的价值观并不清楚。有时，他依据一种联合国式多边主义与民主（虽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民主）的国际价值观来谈论王权；但总的来说，阎试图将先秦道德普世化，却并未明确说明如何继承这些道德，只是说这种道德没有军事胁迫或经济诱惑。阎对另一个关键词的界定也非常不明确：政治。在对《战国策》的讨论中，阎和黄给出了他们对政治实力最为清晰的界定“政治实力是一个现代词，它在古代一般表述为德、仁、道、理、法、贤和圣。”^①然而，这个几乎包含所有中国古代价值观的经典术语清单并未将政治实力与其他形式的实力或影响加以明确的区分。其后，在对同行评论的回应中，阎声称中国外交战略的道德原则“应该与美国所强调的不一样”。^②模糊的正向描述“什么是中国价值观”和清晰的负向描述“什么不是中国价值观”的相互结合暗示我们：政治道德是个活靶子，而不是已得到清晰界定的价值。

对政治道德的负向描述与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先秦项目方式并行不悖。比如，刘的《中国梦》一书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军队建设，正像克里斯托弗·休斯（Christopher R. Hughes）指出的那样，“如果把本书起名为《解放军不高兴》，那么可能会吸引更多眼球”。^③的确，中国2011年军费开支在前一年仅增长7.4%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2.7%。与刘追寻狭隘的部门利益不同，许以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讨论一些大议题：什么对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最好。他通过对政府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15.

② Ibid., p. 219.

③ Christopher R. Hughes, “In Case You Missed It: China Dream,” *The China Beat*, April 5, 2010, <http://www.thechinabeat.org/?cat=7>.

许多宏伟假设的自我批评提供了针对中国未来发展可能性讨论的精妙观点。而阎则认为中国崛起的道德良善是毋庸置疑的，并试图帮助决策者将这些未经检验的价值观普世化。所以，公共知识分子代表了全然不同的大众：刘代表特定利益，许代表人类利益，阎则代表国家利益。

如此工具性的政治思想观点正符合阎曾在为中国领导人提供建议的智库中工作的兴趣。有趣的是，阎不提及其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10 年的工作经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是国家安全部的智库，是中国主要的情报机关。也许他现在想要在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智库工作，但西方的经验表明：智库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很难真正保持独立性，他们要为资助者的观点服务，而这些人基本上是保守主义者。阎或许希望独立智库能够使公共知识分子更好地为政府建言并影响政策。

此外，阎对国外而非国内问题的关注也许会在中国的国际关系读者中引发共鸣，但他若想实现让先秦思想赢得全球认可的目标就应当清楚：中国学者需要运用先秦思想分析本国自身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三）翻译的政治

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对“王”与“霸”作出正确的区分，是《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的重要主旨。该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让以英语为母语的 international 关系读者理解这些常见却难以解释的词汇。虽然作者们采用科学方法来分析这两个概念，但他们仍带有很强的道德性。在此，“王”毫无疑问是好的，而“霸”则基本上是恶的。整个 20 世纪中国唯一一次将“霸权”用作褒义词还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赞成将自己的冷酷与秦始皇相提并论。

既然善恶在这里不证自明，故编辑将“王”的英语翻译从“王权”改为“仁政”并不会在道德上产生什么问题。但当阎及其同事把这些常量与具体国家联系在一起时，比如中国总是“王”，而美国则是典型的“霸”，就显示更多政治宣传色彩了。

上文已指出了将“王”译为“仁政”的一些问题，这里还应该说明

一点，把“霸”翻译为“霸权”其实也会引起混乱。“霸”在现代中文中从来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进所言，它的定义一定包含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侮辱；而“霸权”在英语中则具有很多意思。^①它经常被用于中立地形容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自由主义者认为这个大国制定并维持游戏规则的实施，然而葛兰西式的霸权概念实际强调这种支配是不完全的。所以，当提到美国是个“霸权主义国家”时，英语国家的人们可能只是单纯地认为美国是个强大的国家，而讲中文的人则肯定认为其是邪恶的不道德的。中国承诺不会成为霸权主义国家并不是说它不会成为支配国家，而仅是说它从来不会视自己为不道德的，如经验所示，一般国家也不会自称是不道德的。

阎将“王”与“霸”加以区别并认为二者全然矛盾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②他引用孟子的话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③但国家不都表现它们的仁吗？并且不总是其他的国家认为这个国家是不仁的吗？阎认为，“美国言行不一的政策事实上被国际社会认为是虚伪的霸权”。^④但是，同样的评价也可以针对中国：中国政府说“建立和谐世界”，但它最亲密的两个盟国——朝鲜和缅甸却是世界上道德最成问题的国家。^⑤因为一个人的道德在他人眼中就是虚伪，所以以一个不变而单一的（在这里即中国中心的）道德概念作为基础的分析模式也不具有什么普遍意义。换言之，阎思想的重点，即对王霸的区分，所衍生的问题比解决的更多。

事实上，翻译的政治在中国与其他国家交往中是重复出现的问题。19世纪，东南亚国家就经常抱怨中国官员将他们表达友谊的信函屡次（错

① 徐进 《在儒家的两端》，第276页。

② 如下文中提到，阎有时着眼于“王”、“霸”和“强”三者更为复杂的关系，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在讨论当代国际关系时，他将“王”与“霸”看做反义词。

③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9.

④ Ibid., p. 219.

⑤ 参见 Gilbert Rozman, *Chi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New York: Palgrave, 2010), p. 124.

误) 翻译为归顺的宣言。^① 如果中国真的寻求“尊重与敬服”,^② 那么高级国际关系专家的措辞就应更为谨慎。

坦白地讲, 我们并不能将误译的问题归罪于阎或者其他作者。对霸权的不同理解在中国叙述中非常普遍, 而从“王权”到“仁政”的改变应该是《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的编辑所造成的。如果当真如此, 那么他们给本书的作者们帮了倒忙。他们背离了丛书系列承诺的“从中国的角度了解中国”, 这种翻译的政治真正地并且故意地改变了“辩论的措辞”, 从而无助于中国政府实现相互理解与信任的外交政策目标。

五、学术界之外的受众

按照阎学通在其“先秦项目”研究中所描绘的未来, 中国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强国, 但将是一个行王权而非霸权的国家。根据他的理论, 建立在领导个人责任感和道德基础之上的中国政治实力会和平地给世界带来一个更好的新秩序。在描绘中国未来崛起的前景时, 阎的“先秦项目”在学术界之外还有两类重要受众。在阎看来, 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是不可避免的, 但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答。第一个问题是对他自己的: 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达成该目标; 第二个问题是许多人都关心的: 中国的崛起对世界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因此, 对于阎来说, “先秦国家间政治哲学研究有助于思考如何实现中国的崛起, 以及中国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崛起大国”。^③

其一, 阎的“先秦项目”涉及如何实现中国的“民族复兴”, 它的一

① Anthony Reid, “Introduction: Negotiating Asymmetry: Parents, Brothers, Friends and Enemies,” in Anthony Reid and Yangwen Zheng, eds., *Negotiating Asymmetry: China's Place in A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p. 18.

②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80.

③ Ibid., p. 216.

个受众是中国领导层。阎说他的研究目的是“从先秦思想中汲取经验反思中国当前的发展战略，避免苏联式的半途崩溃和日本式的停滞”。^① 该研究致力于为中国领导层提供一个“更有效的战略”以保证国家的“和平崛起”。^② 其二，阎的“先秦项目”为许多非中国人的观察者解读了中国崛起对世界的意义，这一点在英文版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阎为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结果描绘了一幅非常美好的图景，进而为中国的崛起及其在世界上将要扮演的角色进行辩护。^③ 他认为学习先秦思想“能够让我们思考中国的崛起如何能为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国际规范的进步作出贡献”。^④

（一）国内受众：中国领导层

在阎学通看来，先秦思想家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观点是先秦思想促进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的重要贡献之一，也应该对中国崛起的战略产生重要影响。阎通过对一系列先秦典籍著作的分析证明：中国领导人应该更重视政治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决定性作用。阎主要反对的不是对军事实力，而是对经济实力的过分强调。受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认为王权国家也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而先秦历史中许多例子也可以对该论点加以佐证。^⑤ 由于《战国策》认为拥有单一权力的国家无法称霸，^⑥ 阎敦促中国领导人用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式建设中国国际实力。他对于中国对外政策到目前为止过于注重提升本国物质经济实力，不重视发展政治实力尤为担忧。通过这个研究项目，阎希望恢复中国增强实力在方式上的平衡，鼓励领导人不仅仅局限于保证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还应在国际体系中主动提升自身的政治实力。他再次借助史实“验证了荀子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18.

② Ibid., p. 69.

③ Ibid., p. 23. 另参见 Hu Angang, *China in 2020: A New Type of Superpower*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1)。

④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4.

⑤ Ibid., pp. 70 – 196.

⑥ Ibid., p. 114.

的理论: 在全球外交事务中, 政治实力比经济实力更为重要”。^①

阎学通在其他地方也表明过类似的观点, 不断敦促中国领导人应该更为重视增强政治实力的目标。阎认为政治实力的增强可以通过两方面的努力实现: 其一是建设国内的和谐社会, 其二是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解决国内的社会问题……也是增强国际影响的基础。当其他国家相信一国正向着世界进步和人类正义的正确方向发展时, 那么这个国家也就获得了国际地位。”^② 所以, 阎强调现任领导人构建“和谐社会”的议程对中国未来崛起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他还对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提出了其他几点可供实施的战略建议。根据先秦思想, 王权国家的吸引力不是来源于它的富有, 而是源于其政治思想及社会发展提供的模式。^③ 因此,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王权国家, 必须以“展示给全世界一个更好的社会榜样”为其战略目标。^④ 阎和“先秦项目”其他作者强调了发展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等概念, 这些概念在国际上开始变得越来越流行。^⑤ 许多人认为, “中国模式”已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区别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⑥ 但阎认为对“中国模式”优势的探讨仅局限于发展的纯经济层面, 而中国应该更积极地推广自己领导社会和政治方面的能力。^⑦ 他还认为中国应改善外交形象。

阎指出国际援助领域作为中国善意的外交政策的案例有助于在国际上增强其政治实力。这一例证也表明了王权的中国与霸权的西方在外交政策上的本质区别。阎指出, 虽然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总额比欧美国家少, 但所获得的政治资本远远超过欧美。这是因为中国的援助是无条件的, 足以表

① 阎学通 《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 第145页; 在英文书中的同一段落被修改为“理解荀子思想, 将更有助于强化外交事务政治力量而非经济力量”, 参见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81。

② 阎学通 《中国软实力有待提高》, 《中国与世界观察》2006年第1期。

③ 徐进 《孟子的仁政治天下思想》, 第128页。

④ 阎学通 《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 第159页。

⑤ 潘维 《中国模式: 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⑥ 杨传辉 《孔子的仁德取天下思想》, 第84页。

⑦ 在《中国模式》一书中, 潘维实际上讨论了经济、社会和政治模式。

现出中国是更具有诚意的;^①而西方援助虽然也有其道德的论据,但他们把援助作为使受援国改变其人权状况或生态行为的交换条件。

(二) 国际受众: 消除西方疑虑

《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本身及其如此广泛的宣传,本来就可以视为阎及其合作者们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实力的一次尝试。通过向世界展现中国作为善意大国或“仁政”等概念,该书试图消除西方观察者对中国的善意所怀有的疑虑。阎相信“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国际安全体系”,^②问题是这种影响是什么样的。他对先秦思想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崛起对国家间体系将起到稳定而非破坏的作用。

阎写道“根据先秦思想,中国的崛起可能有两种战略目标:建立王权或者霸权。”^③王权与霸权之间的这个区隔在本书的每一章都表述得十分清晰,而且是贯穿整个研究项目的一个重要主旨。这一思想甚至出现在了中文版的标题中《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阎将两种选择清晰地呈现出来:美国在二战后一直奉行的坏的领导模式,而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强大后会采取好的领导模式。他用几个例子剖析了两种领导方式,认为中国的历史遗产和有关世界领导的古代哲学保证了其将会遵循积极的王权模式,而非负面的霸权模式。

不过,这种对立却并不完全准确。如阎学通以前的书中所说的那样,不是所有先秦思想家都将这两者视为全然相反的概念。比如,管子就没有将霸与王视为对立面,而是认为霸是为完成王这一最终目的的过程。^④采取这种意见就意味着中国也许会争取世界霸权,但这样做只有一种可能,即为了建立最终的王权。

阎的项目也举出了一些中国古代思想中反对使用武力建立霸权的例子。先秦

①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102.

② Ibid., p. 105.

③ Ibid., p. 204.

④ 阎学通、徐进等著《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2页。

思想认为真正的王权不能通过军事实力或阴谋达成,而是由天命决定的。^①许多先秦思想家反对为争夺世界领导权而进行扩张性战争,阎也在其研究先秦思想的著作中强调了这一点。甚至是在以战争为常态的春秋早期,管子还提醒统治者避免过度依赖军队,而应去建立联盟并且互相支持。^②阎认为中国当今的领导人也将在国际外交中遵循类似的模式,所以不应被视为一种威胁。

反对攻击性战争的思想在墨子的作品中表达得最为淋漓尽致,阎将其作为当今中国应该效仿的榜样。墨子哲学的中心是十个关键概念,其中包括“非攻”,大致可以翻译为“反对侵略”。“非攻”不是反对所有战争,只是反对征服战争,因而允许甚至鼓励针对侵略者的攻击。^③同样地,尽管春秋时期的干预相当普遍,但先秦思想家将其合理化,因为这些干预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现状而不是满足扩张的欲望。^④所以,即使在阎对先秦思想的解读中,中国的传统也不是一味的反战主义。然而,阎认为这种反对扩张性战争或以获得霸权为目的而动武的长期传统,表明当今崛起的中国对国际体系而言是一股支持和平而非动荡的力量。

阎想要用《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提升中国国际政治实力的目标不仅体现在叙述的内容上,也反映在叙述的方法上。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一书将“王”翻译为“仁政”,并在译注中将“霸”翻译为“霸权”,该书开头就对这一翻译的安排进行了强调,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会影响整本著作的基调。用“仁政”代替“王权”使中国未来崛起在读者眼中有了不一样的意义。不过,这还不是为英语国家的读者改变的唯一措辞,贯穿全书始终还有许多语言细节上的修改。比如,第二章阎对荀子的研究就与本刊2008年发表的同一篇文章有些区别。

① 徐进 《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流派概述》,第11页;王海滨 《〈吕氏春秋〉中的战争杂学思想》,第69页;阎学通、徐进编 《中国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选读》,第64页;漆海霞 《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载于《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67页。

② 刘江永 《管子的霸业思想》,第45页。

③ Li Bin, “Insights into the Mozi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2, No. 3, 2009, p. 449.

④ 陈琪、黄宇兴 《〈左传〉中的国家干涉思想》,载于《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第203页。

“王”改为“统治者”，^①“王权”改为“仁政”。^② 荀子文章的题目也作了若干修正。“王制”的翻译从“王的制度”改为“仁治”，“王霸”的译法也由“王与领主保护”转为“仁政”。^③ 荀子的第三种领导方式“强”原本被译为“力量”，现在修正为“暴政”，^④也许是为了使其看上去更容易接受。尽管这些语言上的修改很小，而且有些人会认为只是语义上的区别，但是这些改变实际上意义深刻，因为它们改变了全书的基调和整体印象。

除了翻译上的区别，阎学通还重新解释了一些重要的先秦概念，以便令西方读者更易接受。例如，阎深入探究了荀子关于等级制对国际体系稳定非常必要的观点。但他马上否定了任何回归朝贡体系的可能性。^⑤ 他提出不要采用荀子所说的等级制度，而是在现代的背景下以国际体系中差别化的责任取而代之。阎更倾向于公平而非平等，他认为根据实力分配责任（即更大或更强的国家应比更小、更弱的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会使世界更加稳定。^⑥ 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等级体系的积极例证，^⑦ 不过国际组织经常因不奉行平等主义、采用等级制度而受到批评。遗憾的是，阎并没有解释其建立在先秦思想上的体系如何避免重复类似的国家间实力不平等的方式。

六、结语

毋庸置疑，中国的声音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丰富着国际关系的讨论。阅

① 阎学通 《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第 137 页；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73.

② 阎学通 《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第 149 页；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86.

③ 阎学通 《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第 135 页；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70.

④ 阎学通 《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第 151 页；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89.

⑤ 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p. 204.

⑥ Ibid., p. 105.

⑦ Ibid., p. 96.

读阎和其他近期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所撰写的著作使人联想起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著名“思想传播者”严复。严复将许多欧洲哲学、经济和社会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试图解开西方繁荣富强之“谜”。这一探索导致了知识界的政见由“保教”(比如儒教)转变为“保国”。^①

阎学通的研究看重中国的传统思想,表面上与严复的方向背道而驰。但是,阎和他的同事,作为社会科学家,正在研究中国经典典籍,但是这些文本就如同当年《国富论》对严复一样是舶来品。确实,阎学通和严复都对欧洲和中国的著作采取了批判性的研究方式,而且两人都是公共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也都不是毫无意义的探索,而是对不熟悉的思想进行探索,谋求中国实力的提升。思想,不管是亚当·斯密的还是荀子的,都只是达到目标的方法。那么,目标又是什么呢?在严复的时代,中国的崩溃已几无悬念;而在阎学通的时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实力正在不断增强,两个时期的国家利益截然不同。通读《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权力》之后,那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却仍未得到回答。

严复长期而多产的生涯所产生的影响值得我们驻足思索。他不仅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他所处时代各种社会斗争最好的解释,而且还将国家的适者生存作为正规宗旨,把增强中国实力作为首要目标。这些思想所构成的国际政治即“种族战争”的判断,在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竟极为盛行。

“种族战争”的概念在过去 10 年开始在战略著作和大众文章中再度浮现。^② 它的理论依据是,中国将作为一个纯粹的文明国家崛起,与西方的民族国家完全不同。这一被卡拉汉称为“中国说”的说法认定中国是独一无二的特有文明,能够为世界政治问题提供有道德的解决方案。^③ 虽

① 参见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pp. 17-19。

② 刘明福《中国梦》,第 22 页;姜戎《狼图腾》,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这一点在姜戎的《狼图腾》的附录“理性的探索:关于狼图腾的讲座与对话”中得到了极为明确的表达。

③ 参见 William A. Callahan, “Sino-speak: Chinese Excep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forthcoming)。

然“先秦项目”采取略微不同的方针，但其类似的政治道德的统一概念增加了将国际关系争论缩略为王霸国家简单分类的风险。

“先秦项目”没有提出替代“建立世界和谐”的新想法，但似乎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大国应该履行“使世界和谐”的职责，而不管世界是否愿意。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2011 级博士研究生王垦 译)

作者简介

邓子立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2010年在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电子信箱: dengzili2008@sina.com

王翠文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2002年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获史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cuiwen@nankai.edu.cn

徐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2008年在清华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电子信箱: xuj@cass.org.cn

杨原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2010级博士生。2010年7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获国际关系专业硕士学位。

电子信箱: yyir@163.com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美国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国际关系和历史学士, 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硕士,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专著有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等。

电子信箱: johnston@fas.harvard.edu

威廉·卡拉汉 (William Callahan)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系教授。专著有 *China: The Pessimist Nation*;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Resistance in Pacific Asia*; *Contingent States: Greater China and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等。

电子信箱: callahan@manchester.ac.uk

卡宁汉-克洛斯 (Linsay Cunningham-Cross)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候选人。

电子信箱: linsaydc@aol.com